

Sébastien Billioud and Joël Thoraval, *The Sage and the People:
The Confucian Revival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352 pp.

許滄*

The Sage and the People: The Confucian Revival in China 譯自畢遊賽 (Sébastien Billioud) 與杜瑞樂 (Joël Thoraval) 共同撰寫的法文專著 *Le Sage et le peuple. Le renouveau confucéen en Chine*。法文版發表於 2014 年，2015 年獲頒 Pierre-Antoine Bernheim 宗教史著作獎。獲獎當年，英譯本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畢遊賽任教於巴黎狄德羅大學東亞系，長期研究中國民間信仰。杜瑞樂已於 2016 年 3 月逝世，生前任職於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專研牟宗三等當代新儒家學者的思想。本書旨在探討儒家於當代中國的復興，兼採人類學與歷史學的視角，以田野資料為主，歷史文獻為輔。田野調查於 2005 至 2013 年間執行，地域以中國大陸為主而兼及臺灣。本書關注所謂民間的儒家復興運動，運用田野資料考察其與國家權威間的交互關係。同時，本書充分結合兩位作者的專長，探討上述這些現象所蘊藏的世界觀，以重新思考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斷裂與聯繫。

近年英語學界以當代儒家為課題的研究主要分為三種類型，首先是以思想史的視角探討活躍於學界的知識分子如何建構新時代的儒家論述，此可以梅約翰 (John Makeham) 的 *Lost Soul: "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學系博士生

Academic Discourse (2008) 爲代表。其二係思考儒家的倫理價值與政治理念於當代社會的意義，取徑較近於哲學與政治理論。此類作品可以安靖如 (Stephen Angle) 的 *Sagehood: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Neo-Confucian Philosophy* (2009) 與貝淡寧 (Daniel Bell) 對於儒家與民主體制的一系列研究爲代表。以上兩類研究雖論及社會對於相關課題的反應，但仍更多地聚焦於知識分子及儒家理論本身。

最後一類研究試圖從宗教或民間社會的視角窮研儒家在當代社會的位置。孫笑東 (Anna Sun) 的 *Confucianism as a World Religion: Contested Histories and Contemporary Realities* (2013) 與本書均屬此類。孫著雖務求反省既有的宗教概念，進而檢討現有儒家「信仰者」的統計數據，全書的問題意識仍奠基於宗教概念本身及其爭議。相對於此，本書則嘗試建立一種理解當代儒家復興運動的新框架，以「教化」、「安身立命」與「禮儀」爲三大主軸，而兼及所謂的宗教議題。此三項概念皆爲儒家所本有，作者對於研究對象自身主體性的尊重由此可見。較之於既有研究，本書更加具體地呈現了田野對象的生命處境。此種取徑有助於學界將視角轉向具體的基層社會，而不再侷限於知識菁英或概念與數據的分析。當然，所謂基層社會與知識菁英未必能截然二分，本文亦將與作者商榷二者之區別。

本書第一部分以「教化」爲焦點，從教育面向探討儒家在二十世紀的復興。教化不僅指涉道德上的自我修練，同時包括社會秩序之形塑。儒家經典則是此一教化體系的核心。第一章指出，科舉制度於 1905 年廢除後，儒家經典並未完全淡出歷史舞臺。以記誦經典爲教育方式的私塾仍存在於城市與鄉村，書院則以不同的形式賡續傳遞儒家價值的香火。書院往往深具社會關懷，但礙於民國時期的政治與社會條件，影響力終究有限。軍閥與國民政府甚至通過宣揚儒家的價值體系來鞏固其社會控制，如後者於 1934 年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綜而言之，儒家教化仍在民國時期的學校與社會教育體系佔有一席之地，且形式多元。

第二章將視野轉向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指出儒家教化在當代中國的復興同時體現於學院內外。部分大學院校成立了孔子研究院、國學院與國學班。前二者之旨趣為學術研究，國學班則面向社會大眾，尤其是事業有成的商業人士，可見大學院校已肩負起傳播儒家教化的社會責任。在學院之外，各種各樣的當代私塾紛紛成立，少兒讀經蔚為風潮。積極參與少兒讀經的教育者認為，讀經有助於學童加深對於自身文化的認識，並學習做人處世的道理。作者承認此類國學班或讀經運動有其商業面向，然而許多人確實也懷抱著推廣或學習經典的赤誠，不以營利為目的。同時，當代中國的讀經運動已及於成人，部分公司乃至政黨學校亦鼓勵其成員讀經。作者認為這意味著儒家走出菁英群體，真正成爲一種民間的儒家。

第三章指出，當代中國的讀經運動或儒家復興風潮具有反智識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的傾向。此一運動的參與者認為，讀經是一種身心教育，其目的不在知識上的累積。王財貴是新儒家學者牟宗三的弟子，長期推廣少兒讀經，主張「先記誦，再理解」，以讀經為實踐全人教育的途徑，影響當代私塾甚鉅。但王氏的教學方案亦受到批評，或以為就全方面的身心教育而言，遊戲與鍛鍊體魄其實同等重要，不應侷限於記誦經典。部分私塾甚至不願研習前人對於經典的注疏，近乎一種儒家的原教旨主義（Confucian fundamentalism）。作者同時指出，二十一世紀以降的儒家復興運動，實以非學院出身的「草根學者」為中堅。

本書第二部分以「安身立命」為主題，並將儒家宗教面向涵攝於此一概念之下。根據第四章，在當代中國，部分人士為在商業社會中尋求救贖而投身儒家的教化體系。某些個案甚至經由佛教組織的引介，進而接觸儒家經典。例如淨空法師在安徽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組織學校，專門培訓傳播儒家教化的師資，以促進「和諧社會」的實踐。另由於中共對宗教集會的限制，部分佛教團體藉由推廣儒家教化來吸引群眾，惟儒家非官方定義的宗教。但作者同時指出，根據佛教的判教體系，儒家經典確實可以在濟渡眾生的初級階段發揮正面作用。

因此，淨空的做法並不違背佛教的教理。

第五章指出，儒家原為一種教化系統，不能簡單劃歸於宗教、科學與哲學等任何一種來自西方的學科範疇。然而，當現代的學科分類進入中國知識界，作為教化體系的儒家遂受到巨大的衝擊。在二十世紀初葉，康有為等知識分子逐漸認識到西方的宗教觀念，因而企圖建立孔教。但在五四之後，宗教又成為一種相對於科學的、落伍的象徵，部分知識分子試圖切割儒家與宗教的關係，並予以哲學化。本書作者認為，若干當代儒家復興運動的參與者對於儒家的宗教性持否定態度，其實繼承自五四的思維。而當代新儒家學者牟宗三對於儒家思想的詮釋，即可謂一種哲學化的儒家。

第六章旨在說明儒家與國家的關係。在部分曾經歷殖民統治的海外華人社群，例如印尼與香港，儒家作為一種宗教，皆獲程度不等的官方認可。號稱「以儒為宗」而實為「三教合一」的一貫道，亦在臺灣取得合法地位。至於大陸，曾於民國時期大力宣揚儒家價值的各種救贖團體（redemptive societies），均在中共建政後衰落。但許多長期於海外活動且帶有儒家色彩的宗教組織，正試圖向中國大陸地區發展。周北辰即在香港孔子學院的支持下於深圳成立孔聖堂，推廣一種宗教化的儒家，並以促使儒家成為政教合一的國教（state religion）為終極理想。康曉光等保守派學人亦懷有類似的想法，渴望建立一種由上而下的、政教合一的意識形態。《原道》輯刊創辦人陳明則參考海外的歷史經驗與理論，希望儒家成為中國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猶如基督教之於美國。

第三部分以「禮儀」為線索，探討儒家在當代中國的復興，尤其是與政治相關的面向。第七章回顧了中國歷史上國家祀孔活動的變遷。自唐代至晚清，祀孔在國家祭典的位階中均為「中祀」，直至 1906 年才升格為「大祀」，與祭拜天地、先皇的祭典同一等級。本書綜合整理學界的研究後指出，這是為了形塑一種「君民一體」的感受，從而與反清的民族主義者祭祀黃帝的主張相抗衡。基於中國歷代政權對於孔子的推崇，孔子的故鄉曲阜始終是一個具有神聖地位的特殊空間，而歷代政府對於儒家的態度便直接體現於曲阜孔廟的祭祀情

況。北洋政府及稍後由國民黨主導的國民政府較重視祀孔，同時以此鞏固政權。中共建政後，祀孔便不再是國家祭典，而是文化保存活動。文化大革命期間，曲阜孔廟受到嚴重破壞。改革開放後，中共對於孔廟的態度又有所變化，起初係出於經濟目的贊助祀孔，以促進當地觀光業的發展，後來曲阜漸漸被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徵，政治意味愈濃。

在第八章與第九章，作者比較了 2007 年官方於曲阜舉行的「中國國際孔子文化節」與當地的民間儒家復興組織自行舉辦的祀孔活動。在官方活動中，孔子的形象非常模糊，活動本身則兼有政治與娛樂意味。相對於此，民間舉辦的祀孔活動更具肅穆的氣息，成員們互為進德修業的夥伴。這些民間組織的參與者也往往認為，較之於官方與學界，他們對於儒學的嚮往更為真誠。他們甚至強調，儒家在未來的復興必須以民間力量為中堅。本書同時指出，這些社群與官方乃至學界的關係相當複雜，時而藉助對方的力量發展自身，時而刻意保持距離。

第十章表示，來自西方的「宗教」概念不能完全涵蓋儒家涉及的面向，本書因而將「政治與宗教」視為一個統合性範疇，來分析宗教祭典與國家典禮之間的關係，同時以中國大陸與臺灣的情況互為參照。若只論國家贊助的儀式，現今中國大陸對孔子採取一種世俗化的態度。如前述「中國國際孔子文化節」體現了對於民族與文化的稱頌，帶有高度的政治性與民族主義色彩。在這場儀式中，「可見世界」與「不可見世界」之間的溝通幾乎付之闕如，一切活動皆為此世服務。相形之下，臺南孔廟的祭典卻充分流露參與者同神靈溝通的意圖，作者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祭祀活動，並體現中國傳統的「連續性的本體論」（continuist ontology）。此種本體論恰恰相對於西方傳統中傾向於二分「世俗與神聖」、「可見與不可見」的二元主義（dualism）。就此而論，中共官方對於孔子的態度似乎相對世俗化，但民間的儒家復興運動又並非如此。作者接著表示，臺灣一貫道組織於 2011 年舉辦的祈福大典，不僅是一場宗教祭典，也是一場國家典禮。與會政要甚至在致詞中稱頌一貫道於民間社會宣揚儒家

價值的貢獻，政治權威被妥善地安排於宗教祭典之中。但祭臺背景乃巨幅的「無生老母」與其他一貫道神祇，並無孔子的形象，作者稱之為一種「無孔子的儒家」（Confucianism without Confucius）。相對於此，由中國大陸官方出資的孔子學院則呈現了一種「無儒家的孔子」（Confucius without Confucianism）。作者因而認為臺灣比海峽對岸更有條件將儒家發展為一種公民宗教。

作者以「教化」、「安身立命」與「禮儀」等三組提煉自儒家傳統的概念來探討儒家在當代中國的復興，並由此構成本書的三大部分。教化、安身立命與禮儀確實是儒家的基本規模：儒家作為一種教化體系與身心之學，以修練個體道德與建立群體社會秩序為內涵，以安身立命為終極目標。禮儀乃理想秩序與倫理的體現，小至個體之間的關係，大至社會與國家乃至天地之間的互動。這些議題可能具有宗教性，但絕非宗教範疇所能統攝。本書捨棄了傳統的宗教範疇，根據儒家自身的特質來設計切入視角，對於議題的討論也更加全面，兼涉宗教史、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與社會史等不同的領域。

The Sage and the People 對於時間軸的處理亦甚具層次感。本書主要關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幾乎是一部研究當代社會的論著。全書三大部分的第一章均為針對相關議題的歷史性回顧，且聚焦於本世紀以後的發展。此種詳今略古的提要方式，既具備歷史縱深，卻又不失焦點。舉例而言，第一部分論教化，首先回顧二十世紀上半葉私塾與書院等傳統教育機構的轉型，接下來兩章再運用田野資料說明當代私塾的新型態。通過比較，讀者尤能體會當代私塾所蘊藏的時代性，及其對於傳統的革新或繼承。作者同時對於儒家復興運動的未來保有一種恰如其分的關心。本書指出，救贖團體曾在民國時期的中國大陸與當代臺灣推廣儒家價值，貢獻卓著。作者又不無期待地表示，臺灣的一貫道團體曾在官方交流渠道的協助下與對岸接觸，而中共亦期望藉由提倡儒家價值來抑制基督教的發展。其言下之意似乎是，中國大陸若能取消對於一貫道的禁令，當代中國的儒家復興運動很可能另闢新局。

本書格外值得商榷處乃對於「民間」（the space of the people）概念的定

義。作者開宗明義地表示，這是一部關注當代中國民間儒家復興運動的著作，以非官方與非菁英的人群與活動為考察對象。然而，民間與菁英究竟能否截然二分？本書再三提及王財貴對於推廣儒家價值與少年讀經運動的貢獻，但王氏不僅為牟宗三的入室弟子，亦曾於臺灣地區的大專院校任教。王財貴固然已深入民間，謂之知識菁英亦無不可，可見菁英與民間的分野其實是相當模糊的。在宋代以降的傳統中國，學者大都由民間出身，致仕後又往往回到民間，在地方社會扮演重要角色。換言之，知識菁英本存在於民間社會，兩者從來不是零和的概念，故本書對於民間概念的使用宜再斟酌。與此相關的是，作者對於儒家在前現代中國的想像，似乎侷限於科舉制度所區劃的知識階層。但儒家作為一種作者所標舉的教化體系，其實長期通過宗族與祭祀組織來維繫整個中國社會的基本秩序。就此而論，儒家從來未曾於民間社會缺席，本書所關注的儒家在當代社會的熱潮，或許仍是一種對於傳統的延續。儒家並非走入民間，而是回到民間。

另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當代中國的儒家復興運動強調其自身的民間性，仍同時從兩方面向所謂的菁英知識分子汲取理論奧援，其一是港、臺新儒家，如牟宗三之於王財貴；其二是大陸新儒家，如蔣慶之於周北辰。然而，港、臺新儒家與大陸新儒家對於許多根本議題的看法南轅北轍。舉例而言，牟宗三對自由主義懷抱著高度信仰，以民主為未來體制的基本框架；以蔣慶為首的大陸新儒家則明白以建立儒教國為終極目標，大加發揮儒家經典的權威性。本書已識及港、臺與大陸新儒家同時對當代中國的儒家復興運動產生影響，但並未說明雙方的矛盾如何在所謂的民間層級得到調解，或產生化學變化。若能稍加放寬對於「民間」的定義，或更立體地理解「民間」這項概念，本書將可能更加妥善地處理此一問題。

最後，本書有一項細部論述值得商榷。作者在本書第三章以「反智識主義」來理解王財貴「先記誦，再理解」的讀經教育主張，似稍有未安。「先記誦，再理解」並非不求智識上的積累，僅將經典當作自蘊法力的咒語來誦讀。其作

爲一種教育與學習的策略，乃期待幼時記誦的經典能成爲學習者的知識底蘊，從而得以在不同的生涯階段時時體會，逐步加深理解。經典亦緣此成爲學習者終身的指引。